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06BZS022）最终成果

# 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

## ——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

◎ 刘玉峰 著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06BZS022)最终成果

# 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 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

刘玉峰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  
/刘玉峰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07-5195-5

- I. ①唐…
- II. ①刘…
- III. ①经济结构—研究—中国—唐代
- IV. ①F1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747 号

责任编辑: 陈海军  
封面设计: 张 荔

---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0.5 印张 28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 目 录

绪 论	(1)
一、唐代经济史研究的简略回顾	(1)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16)
三、研究方法思路:专题探讨与整体把握	(20)
四、概念使用与说明:所有权结构与所有制结构	(21)
第一章 唐代土地所有权状况与结构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	(22)
一、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与结构的形成及其特征	(22)
二、土地所有权状况与结构的发展变化和原因、影响	(43)
三、重要特征与恶性规律	(59)
第二章 唐代农业经济所有权结构及其发展变化	(62)
一、官营国有农业的门类及其发展变化	(63)
二、个体农户经济的形成、特征及其发展变化	(114)
三、富贵集团田庄经济的恶性膨胀及其恶性特征	(182)

第三章 唐代工商业经济所有权结构及其发展变化 .....	(196)
一、官营国有工商业的门类、行业及其发展变化 .....	(197)
二、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阶段及其封建性特征 .....	(238)
三、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屡禁不止及其恶性特征 .....	(256)
第四章 唐代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 .....	(273)
一、税收体系与结构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 .....	(274)
二、禁榷垄断利润及其财政地位和性质、影响 .....	(291)
第五章 整体的观察和认识:唐代经济结构的结构形态和主要特征 .....	(297)
一、结构形态 .....	(297)
二、主要特征 .....	(300)
主要参考文献 .....	(305)
后 记 .....	(319)

# 绪 论

## 一、唐代经济史研究的简略回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1922年,内藤湖南正式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sup>①</sup>,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末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该文认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

---

<sup>①</sup>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历史与地理》1922年第9卷第5号,汉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该文正式发表的时间,参见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作者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具体认识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内藤湖南和吕思勉均持“唐宋变革”说,他们关于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论述及研究方法,实开经济史学科意义上的风气之先,对后来的唐代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大论战时期,中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sup>①</sup>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唐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昇、黄毅仙、傅安华、刘兴唐、黄君默、易曼暉、武仙卿、邓嗣禹、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系统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

<sup>①</sup> 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重要论文。如黄毅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食货》1卷1期,1934年)和《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卷10~11期,1935年);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食货》1卷2期,1934年,傅安华译);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卷4期,1935年)和《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卷6期,1935年);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2卷9期,1934年)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3卷4期,1936年);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卷10期,1935年);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和《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卷8期,1936年)以及《唐代处理客商及蕃客遗产的法令》(《食货》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社会科学》2卷1期,1936年)等;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年);黄君默《唐代的货币》(《食货》4卷11期,1936年);铃木俊《唐代官僚蓄积之研究》(《食货》4卷8期,1936年,王怀中译);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食货》3卷5期,1936年)和《唐代的人口》(《食货》3卷6期,1936年);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武仙卿《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食货》5卷1期,1937年)。全汉昇发表了多篇长文巨制:《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

重要的论文集和著作。如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吴杰译),收录论述唐代庄园、市、草市、车坊、居停、柜房及行会的论文,多属拓荒之作。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论述了官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的销售方式及资本流动、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行会等重要问题。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分六节作了



具体探讨。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是第一部唐代断代经济史专著,广泛讨论了国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税、地税、两税、庄田、庄墅、交通与都市、市、草市、庙会、行会、工匠、色役、资课、商税、茶税、酒税、青苗钱、柜房、邸店、飞钱与便换、高利贷、雇佣、客户、漕运、盐铁转运、东南财库等问题。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是第一部唐代断代财政史专著,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官业收入与税商、特种收支、财务行政六章,纲目清晰地论述了唐代的财政收支与财政管理;《刘晏评传》(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分家世、时代背景、传略、转运盐法税制改革、常平铸钱、经济思想与战时财政、政治观念与属吏登庸、轶事与遗文几部分,详细探讨了刘晏的理财背景及成就。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专著,分阶级、风俗、借贷、交通四章,均与唐代经济史有关。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辟有“财政”一节,指出李唐建国后承继北朝以来之财政制度系统,但是随着武周特别是玄宗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政制度随之而演进——“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深入论证了运河是否通畅对唐宋帝国盛衰以及经济地理变化的影响。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北京和记印书馆 1944 年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编),论及唐代金银货币在私经济方面和官经济方面的用途、唐宋时代金银之种类及形制、金银钱、金银器饰、金银价格、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入输出问题等。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开明书店 1947 年初版,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收录了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关于敦煌户籍残卷考释、唐代过所文书、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释的论文,并在《译者后记》中对辑译诸文进行评介,对某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申论。

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12月创刊,1937年7月停刊),是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有力推动了包括唐代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食货》4卷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把当时能见的敦煌户籍丁籍收罗在一起,直接推动了唐代籍账制度的研究。陶希圣还组织编印《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共印刷出《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唐代之交通》三种,《土地法令》《唐代之都市》《工商业与货币》《动荡中的唐代经济》《财政制度》五种正在印刷之中,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北平(今北京),没有能够印刷出来。1971年,《食货》杂志在台湾复刊后,才最终印出。

这一阶段,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揭示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在唐代经济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奠基性成就。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阐明中国古代的历史,第一次把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生产方式有规律递替的历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了一个勾画——“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sup>①</sup>,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吕振羽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创刊号,1934年4月15日)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认为:中国经历原始社会之后,殷商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西周时期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即领主制封建社会,东周时期(即春秋时期)是领主制封建制发育完成的时代,而且最典型;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发生变化,旧封建领主所

<sup>①</sup> 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支配的农奴经济,让渡到新兴地主的农奴经济;自秦代开始进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系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由秦代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夜,这种经济性质的内容,并不曾改变,只在封建经济的体制内连续的发展,但并不曾中断”。吕振羽还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 1934 年版)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 1936 年版),阐述了中国原始社会、殷商奴隶制社会和西周封建制社会理论。郭沫若和吕振羽的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sup>①</sup>。

具体到唐代经济史研究,吕振羽发表长篇小说《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2 卷 4 期,1935 年冬季号),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观点,考察了隋唐五代直至宋朝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变动,分析了这一期间社会经济的构成、性质、生产组织形式及其剥削关系,着重论述了农民经济(包括佃农经济)、小地主经济和大地主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斗争和消长变化,阐述了经济因素在这一时期政治变动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唐代经济形态和政治变动的最早论文之一。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法》(《时与文》2 卷 11 期,1947 年,又收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 1948 年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两税法,把两税法改革与封建社会经济权力变化、官僚政治变化等联系起来研究,得出许多深刻结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唐代经济史的研究迅速取得重要成就,并为新中国建国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正确方向。

总之,第一阶段筚路蓝缕,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许多重要课题,包括唐代社会性质、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发展状况及变化、土地制度、户籍制

<sup>①</sup>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寺院经济、阶级关系、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手工业、商业、贸易、都市、市场、货币、交通、漕运、人口等等,为唐代经济史研究提出了众多基本概念和主要范畴,基本建构起了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这一阶段,学界展开了社会史大论战,由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而去探讨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而去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问题,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展开争鸣论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各派学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包括唐代经济史研究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一开始就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轨道,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把经济史作为整个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基础部分,或者说把社会发展视作一个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机整体来研究,并形成了相沿至今的传统。<sup>①</sup>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吕思勉、岑仲勉、李剑农、彭信威、白寿彝、贺昌群、唐长孺、杨志玖、李埏、宁可、李文海、金宝祥、王永兴、孔经纬、吴枫、韩国磐、王寿南、章群、吴章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发表了许多成果,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唐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取得重要成就。

这一阶段出版了多部隋唐五代史的断代史著作。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是第一部隋唐五代断代史著作,经济史方面论及唐代经济发展及变化情形、均田制的确立及破坏、租庸调制、两税法、工商业的繁荣、交通的发达、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和庄园制的发达等。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论唐史共68节,论及漕运、马政、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户口升降、籍账、和籴、财政思想、钱币、矿冶、庄田、俸料、公廩本钱、职田、社会组织、手工业及物产、市虚及商务、交通、水利、服饰等经济史问题。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

<sup>①</sup> 参见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1958年版)对唐代均田令、租庸调制、两税法、土地占有形态、漕运、农业、官营/民营手工业、商业、城市、对外交通与经济文化交流、地主庄园经济、经济重心南移、新兴市民阶层等论述广泛。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十五章《隋唐五代社会组织》、第十六章《隋唐五代社会等级》、第十七章《隋唐五代人民生计》、第十八章《隋唐五代实业》、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均与经济史有关，或是经济史专论。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用两章篇幅论述了唐朝封建经济的繁荣、封建剥削的加重以及两税法和唐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庄园经济、财赋重心南移等。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断代史著作，如傅乐成《隋唐五代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57年版)、章群《唐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58、1980年版)，对唐代经济史也均有所阐述。

经济史专著。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四章《唐代的货币》，列货币制度、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与信用机关四节，考证翔实，论说精深。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版)是综合性的经济史专论，隋唐经济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总叙》、第九章《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第十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第十二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到两税》、第十三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以动态和联系的眼光阐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多与汉魏南北朝及五代两宋时期史实相比较，多有卓越识见和重要发现。吴章铤《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分土地问题、租税问题、农民地主政府三章，研究内容包括均田制度、租庸调、贫富关系等共计18节，研究方法和思路均符合唯物史观，许多结论颇为深刻，如指出“不仅农业，国家对任何产业的处理态度，都是财政的”。

重要论文。如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和《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金宝祥《唐代封建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岑仲勉《租庸调制与均田制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均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和《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及其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和《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及《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李文海《唐代官手工业的性质和作用》(《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8~9期)、《唐代的商业与商品生产》(《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孔经纬《关于唐宋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3期);黄冕堂《论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地位》(《山东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宁可《评陈寅恪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问题》(1959年1月22日《光明日报》)、《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1959年9月8日《光明日报》);杨德泉《唐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扬州师院学报》1959年第3期);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及《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几个问题》(《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史念海《开皇天宝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9年第6期)、《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

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张维华《中唐以后的地主田庄经济》(《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王仲华《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张泽咸《唐代的客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

这一阶段,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唐代土地所有制形式成为讨论的重要方面,主要围绕前期均田制和后期大土地所有制展开。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提出皇族地主土地垄断制为中古封建社会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著名观点,引发了大讨论。胡如雷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1956年9月13日《光明日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包括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金宝祥发表《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3期),认为唐初到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主要历史内容正是世族地主所有制向庶族地主所有制的转化,封建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专著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持土地国有制论。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曾我部静雄《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讲谈社1953年版),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等。

第三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此后十余年,唐代经济史研究停滞不前。1976年“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大陆的唐史研究队伍扩大,学术交流

活跃,唐代经济史研究保持着良好发展形势:一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引进,理论思维、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化;一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研究领域进一步细致深入,探讨的问题更加微观和专门,并出版了多部专题研究论著,其中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著作较多,成为特色;一是同时又注重宏观考察和综合分析,出现了一些整合性研究成果。

重要论文。如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傅筑夫《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郑学檬《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黄盛璋《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黄永年《唐代两税法杂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和《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金宝祥《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孔祥星《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和《略论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和《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年第2期);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重要著作。如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是隋唐经济史卷,广泛论述隋唐时期的经济地理与人口、交通、劳动、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与物价、经济的巨大波动等。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论及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公廩本钱、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田庄、马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篇《论唐代的变化》之第一章《社会经济的变化》,从南北人口分布、均田制的最后放弃和土地占有形态、赋役制度的变化、商品经济与商税、经济重心的南移五方面展开了论述。田昌五、漆侠总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卷第4编《隋唐五代时期》,论述了户口与农业经济区域、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方式、官私手工业、商业、社会阶级结构、地租形态、赋役制、政治经济思想对于社会经济史的作用等。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分农业、土地关系、手工业、商业、货币与物价、城市与交通、区域经济、财政八个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隋唐五代经济地理、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农业、畜牧业、渔猎业、林业、手工业、商业与借贷,以及奴婢、部曲、雇工、佃农等。

经济史专著和论文集。如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版),研究了唐朝仓储制度和仓廩系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赋税徭役探讨翔实。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论述了隋唐运河的渊源、开发和作用等。周藤吉之等《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姜镇庆等译),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论文集。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探讨了唐代四川的区域经济地理、农业、土地所有制、赋役、纺织业、盐业、茶业和糖业、造纸、印刷和造船、商业及交通运输等。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探讨了以稻作和茶叶为中心的农业发